

國際關係理論信任觀點與全球氣候治理： 國家利益與國際信任的關係

郭雪真

陸軍官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國家之間的信任、不信任、猜疑是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議題，國際關係學者提出各有差異的國際信任觀點，並沒有共同一致的主張，尤其是信任與治理之間的作用關係。全球氣候治理也是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議題，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人類生存，需要全球人類集體的關注與行動維護其穩定，尤其是需要全球國家協調合作與信任。目前已逐漸發展若干的規範，但仍無法有效的治理，有學者提出仍需建立信任為先。這涉及到全球治理背後國際關係理論觀點所衍生的推論與結論，特別是國家利益與國際信任之間的關係。現實主義認為利益是先於信任而來，甚至不存在信任，一切以利益為先。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偏好先於利益，藉由相同國家體制及國際建制而產生信任與合作；建構主義則認為集體身分認同先於利益，相同身分認同而相互建構信任。無論何種理論的國際關係學者在探討國際信任之時，多是主張國際信任有助於國際（全球）治理，即是國際信任能提升國際合作，國際合作有助於國際規範的建立、遵守及順服，國際規範順服意味著國際治理的成效，有效的國際治理就能增強國家利益、國家偏好或國家集體認同。在研究全球氣候治理議題中，都可以選擇不同的理論觀察特定國家或集團國家的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而綜合理論觀點分析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

關鍵詞：國際信任、氣候變遷、國際關係理論、全球氣候治理

The Concep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Trust

Hsueh-Chen Ku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litary Academy, ROC

Abstract

Trust, mistrust and suspicion among nations are the research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these scholars proposed varying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trust without common consensus, particularly the effects between trust and governanc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s also the research issues concerned by scholars, f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human existence needed human collective concerns and actions to maintain its stability, particularly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and trust among the nations on the earth.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has developed some norms but is not effective; some scholars argued we still need to build trust in advance. This argument involved the inferences and conclus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hi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trusts. Realism takes international trust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is no national interests, no international trust. Liberalism takes international trust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preferences where one can build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same national establishments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nstructivism takes international trust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ies where one can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trust through the same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ies. No matter what the theory is, we all agree international trust is beneficial to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hat is, international trust promot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obeying, and comply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omplian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mean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increases national interests, preference and identity. In research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each theory can be selected for observ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countries or a bloc of countries, through theoretical synthesis to analysis the future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ust,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郭雪真

信任可以最佳被理解為即使不確定但仍然相信。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dler, 1998: 29) -

如果人們百分之百確定（相互）關係，則就不需要信任了；信任變成不相干的概念。

-Ken Booth and Nicholas J. Wheeler (Booth, 2008: 230) -

壹、前言

信任是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Carter, 2011; Giczi, 2009)、社會美德 (social virtues) (Fukuyama, 1995)，是社會之所以存在的條件之一。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遑論社會的治理。國際社會或國內社會若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信任，有助於國際治理與國內治理。對於國際治理而言，諸如國際規範、國際談判、國際條約及國際建制 (regimes) 的建立與履行，都需要國際社會的相互信任。民眾對於國際事務也有著不同的信任感，包括對於本國政府及其他國家政府，連帶著也影響到政府對於國際事務的處理 (Brewer, 2004)。國際關係研究已經對於「信任」概念進行許多研究，因為信任與不信任在國際關係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足以帶來戰爭與和平的差異，信任使國家之間能夠合作，不信任則帶來衝突。

冷戰的開始與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的合作，都是涉及到信任的國際關係重大議題 (Kydd, 2005: 3)。因此，國家不時相互推測或猜疑對方的動機，也就影響到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是要衝突還是合作，是要降低或升高衝突，還是要拒絕或同意合作。這都涉及到對於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之假定，特別是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最大的差異就在前者是發生在國際無政府狀態 (international anarchy) 之內，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沒有強制執法的機構；後者則是發生在國家秩序之內，由中央政府強制執法維護秩序。尤其在歐洲整合方面，歐盟成員國若沒有互信，各項政策也就難以在一致中又能差異化 (Balzacq, 2012)。國家之間的信任、不信任、猜疑遂成為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議題，學者嘗試提出增進國際信任的主張或建議，例如權力平衡、國際法、外交、戰爭、強國、國際社會等等 (Bull, 1995)，以避免衝突而增進合作，確保國際的既有秩序。國際關係學者提出的國際信任觀點各有差異，也沒有共同一致的主張，尤其是信任與治理之間的作用關係。這涉及到這些學者背後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所衍生的推論與結論，有必要回歸到國際關係理論進行理解。

國際關係理論假定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或「國際無政府狀態」(international anarchy) 為理論前提，即是缺乏至高無上的權力或權威維持秩序與履行約定，

國際之間是個失序的不確定關係。當前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三者對於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或「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理論假定前提皆有所不同，衍生出對於國家之間的互動也有不同的推論。以國際信任與治理而言，現實主義推論國家之間沒有信任的存在，有也是基於國家權力與利益而來，也可基於此而背叛，所以，國際治理無關信任。自由主義推論國家之間有信任的存在，是基於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來，國際制度培養國家之間的信任關係，有助於國際治理。建構主義推論國家之間有信任的存在，是基於相互建構的集體身分而來。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國際信任觀點是作為本文探討的全球氣候治理之理論基礎，就能了解全球氣候治理的危機與弔詭，即是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

地球氣候影響人類生存，氣候變遷需要全球人類集體的關注與行動維護，尤其是需要全球國家協調合作，因為氣候變遷是沒有國界的，但地球大氣層是人類共有的公共財（common public goods），不免出現「不勞而獲」（free-riding）的狀況，有些國家圖享其成，有些國家徒勞無功；加上各國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不同，造成氣候汙染惡化的國家不一，氣候變遷的時機、範圍及衝擊都尚未確定，使得全球國家對於全球或全球氣候治理仍有猶豫與爭論。自 1960 年代起，在科學家的倡議下，聯合國逐漸將氣候變遷列為全球議題，歷經四十多年努力而逐步建立相關的全球氣候建制（regimes），目前主要的是「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及其相關的決議或協議，意圖藉由此國際規範治理各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權利義務，以集體行動維護地球氣候的正常狀態或減緩其惡化。然而，即使歷經二三十年的國際會議及簽署相關的協定或協議，全球氣候治理結構構造仍是破碎不全，尤其是公私制度機構之間的特質、組成、空間範圍、關切議題及目標都是如此（Zelli, 2011）。在建立全球氣候建制過程中，各國基於國家利益而有不同立場，在相互不信任的狀況之下，在談判過程中，形成各種不同的談判聯盟，運用各種談判策略而建立不具約束力的全球氣候建制與規範。因此，全球氣候治理不宜以單純的國家利益界定全球氣候建制，全球氣候變遷規範治理各國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不免影響到各國的國家利益，但在地球生態互賴需要全球國家相互信任，消除國家利益與全球氣候治理及建制之間的緊張關係。

誠如上述，國際信任是否能先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是值得研究的議題，能否藉由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國際信任的研究觀點，以說明全球氣候治理所涉及到的國家利益與國際信任之間的關係。不同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前提假定衍生的推論與結論，提供了觀察不同國家在制定全球氣候規範與治理的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的考量。

貳、（國際）信任概念的定義

雖說國際關係學者並未研究發展出嚴謹的國際信任理論，但國際關係學者嘗試引進其他學科的理論以概念化「信任」或是藉以說明國際事件的發展。例如 Andrew Kydd 的觀點，國際信任理論有四項主要的啟示：第一，合作需要國家之間一定程度的信任；第二，國家較不信任曾經涉及衝突的其他國家；第三，霸權國家若值得信任，則霸權國家有助合作；第四，國家之間若是值得信任，則就能相互確信值得信任，進而相互合作（Kydd, 2005: 8）。根據 Brian C. Rathbun 的觀點，北大西洋公約的盟國是基於道德式的信任（moralistic trust）而成為安全社群，即是成員國相信其他成員國會履行其道德義務，促進相互合作及增強信任，以及其擴散式的互惠，使其成為一個美德的信任團體（a virtuous circle of trust）（Rathbun, 2011b）。乃至東南歐安全社群的建立與未來，也是需要先建立信任（Cross, 2013）。

以下略述若干學者的國際信任概念主張，以說明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國際信任的基本觀點，作為理解其能否運用於全球氣候變遷治理與建制。當然這些國際關係學者主要關切的是基本的概念，從基本概念出發而逐漸延伸至各種不同的議題。

一、Ken Booth 和 Nicholas J. Wheeler 的國際政治信任概念

Booth 和 Wheeler 曾經藉由信任的四種屬性（properties）發展國際信任概念，並藉以說明 1993 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建立信任，簽署「奧斯陸（和平）協定」（Oslo Accords）解決雙方衝突的過程（Booth, 2008）。他們先行定義「信任」是：

當兩個或更多的行為者基於相互詮釋彼此的態度與行為，相信對方在現在及未來可以信賴其不會以損害他們的利益及價值方式行事時，信任就存在了。這樣最低程度的信任對應於最高程度的信任是行為者嘗試提升相互的利益與價值，包括在不可被觀察的情況下。由於信任是被鑲嵌在政治單元之間，它必須是決策者之間的正面關係藉由相互學習過程而複製到社會之間，反之亦然。藉由以下的配對屬性而產生可能的其中一種的信任關係：在隱密未知/不確定性中的躍進（a leap in the dark/uncertainty）、同理心/連結（empathy/bonding）、依賴/易脆性（dependence/vulnerability）及正直/信賴性（integrity/reliability）（Ibid, 230）。

第一種屬性在隱密未知/不確定性中的躍進是指在不確定性中尋求表達及產

生信任關係；第二種屬性同理心/連結是指感同身受（empathizing and sympathizing）而建立信任關係；第三種屬性依賴/易脆性是指信任造成相互依賴及必須接受信任關係的易脆性，即是背叛的風險；第四種屬性正直/信賴性是指相互相信對方的未來行為（Ibid, 234-245）。

簡言之，國際信任存在著不同的屬性而有不同的信任程度，從不確定而到確定，從現在而到未來，從相信到背叛等等，都說明了其的易脆性及變化性。

二、Aaron M. Hoffman 的國際信任概念

Hoffman 指出國際關係學者同意「信任」指涉一種態度，就是願意將利益的未來發展置於他人的控制之下；「信任關係」（trusting relationship）是「信任」的行為具體化；信任關係的強度與範圍是可以變化的；信任其他人涉及對其未來行動的預測；行為者藉由主觀的概率評估信任他人風險（Hoffman, 2002）。但學者之間對於「信任」的定義仍有歧異，主要有期望預測及信託責任兩種定義途徑，他採取信託責任的途徑藉由測量領導者的政策選擇認知、國家監測被騙的機制，以及檢視構成相互合作的規則嚴謹度，以概念化及經驗性研究「信任」及「信任關係」（Ibid, 379-384）。他並歸納出三種培養信任關係的理論（學習理論、認同理論及制度理論），並以個案研究檢視此三種理論，主張只有藉由制度機制藉低背叛才能建立信任（Hoffman, 2006）。

三、Deborah Welch Larson 的國際信任概念

由於國際關係並沒有信任理論，Larson 藉由其他學科信任理論說明國家之間由於不信任而造成外交失敗，她歸納出理性抉擇、國內結構與正當性，以及心理因素三點說明國家決策者對於對方國家的動機及意圖做出錯誤的推論而錯失合作的機會。因為如果國家決策者是穩健的，在理性抉擇之下，就會觀察對方國家的信譽及評估雙方的利益，而且國內政治結構鼓勵或迫使決策者不信任外國，藉以正當化其國家自主及主權獨立，這樣的不信任感致使國家決策者忽視了對方國家展現的合作訊息或提議。但可以藉由循序漸進的方式相互測試對方的善意，或是先行讓步等等消除這樣的不信任感而以互惠方式達成合作（Larson, 1997）。

四、Torsten Michel 的國際信任概念

Michel 認為既有的研究文獻對於主流理性主義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的信念概念批評是內部不一致且概念不完整，也未提出實質的替代選項。他遂將情緒 (emotion) 概念納入「信任」的概念化中，並且強調信任與易脆性的關係。她認為國際關係學者多是以不確定性下的信賴 (reliance)、理性計算、策略抉擇概念化「信任」，忽略了在理性決策之前的情緒因素。他認為信賴是客觀的、結構的、深思熟慮的、理性的及策略的決策過程，代表著經過風險計算的結果；信任則是主觀的、個人的、無法計算、情緒的及道德的傾向 (disposition)，尤其在負面效果造成傷害的面向 (dimensions of harm) 上兩者更是不同，前者是失望，後者則是背叛而且前者並未說明國際體系的易脆性 (Michel, 2012; 2013: 94-102)。他認為信任是以聯合的 (associative) 方式 (例如國際規範、制度化過程等等) 管理或處理國際體系易脆性，國際政治就在降低易脆性而非以互惠擁抱易脆性 (Michel, 2013: 88)。信賴與信任是不同的概念，對於易脆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前者是功能性的易脆性 (functional vulnerability)，建立在特定目標、利益、誘因及風險的判斷及特定的角色期望與能力的工具理性決策過程，當角色表現未能符合期望而沒有功能，這就是失望，其所受到的傷害就是對此功能面向判斷錯誤的結果。信任則是存在的易脆性 (existential vulnerability)，涉及到在共同生活世界內的相互關係，當出現負面結果 (背叛)，其所受到的傷害面向是對相互關係的不確定，所以信任是在生活世界「與他人在一起」(being-with-others) 的情緒 (Ibid, 102-104)。

總而言之，國際信任概念言就已經逐漸受到國際關係學者的關注，似乎假定了只要建立與維持信任就能產生有效的國際治理。即是假定了個人擁有的社會信任層次強烈地受到國家力量與該國治理效能的影響。因此，國家菁英與群眾的社會信任層次是決定國家國際行為的主要因素，整體的社會信任層次是可以精準預測該國所曾經歷的國內外政治暴力的層次。低社會信任層次的國家較可能採取敵對的態度回應國際情勢發展，領導者較易採取激烈的行為或發動國際衝突或戰爭 (Kydd, 2005: 82-89)。同時，建立沒有暴力的國際體系的最直接路徑是由強國聚居其中，其有效的治理培養了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及高層次的整體社會信任，這類的強國是較不好戰的 (Ibid, 164)。彷彿只要各國相互信任，就沒有不可治理 (ungovernance) 的問題了。

參、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國際信任觀點

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中，以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為主要理論學派，各理論源自其基本的觀點或前提而對於「國際信任」出現不同的主張。三者皆對於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行為做出不同的理論假定，現實主義假定國家行為受

到此狀態的結構限制，國家之間相互衝突，國家必須自助自利沒有國際信任；自由主義假定在此狀態的現制下，國家仍有其偏好，國家之間仍可選擇合作，先選擇信任與合作而獲取共同利益；建構主義假定此狀態是由國家權力政治所造成的，國家之間的身分認同是先於利益，相同的身分認同產生相互信任及利益。

一、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假定國家是個理性的行為者，生存與安全是國家的首要目的。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由於資源（例如領土、物資、人口等等）有限，國家之間為了國家生存與安全而有相互衝突的利益，國際體系是國家相互為敵，國家必須強化其權力獲取利益。尤其是運用軍事力量強化權力造成國家之間的誤認（misperception）對方意圖與目的，致使軍備競賽、衝突加劇，更加不安全及不信任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Jervis, 1976; 1978; 2001; Hertz, 1950; 2003）。誠如 John J. Mearsheimer 認為國家之間少有信任的空間（Mearsheimer, 1994/1995: 11），因為國家從未能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Mearsheimer, 2001: 31）。換言之，國際無政府結構下的不信任遂成為現實主義的基本觀點，國家為爭奪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且對於其他國家的動機意圖不確定，怎會相互信任呢？特別是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而非道德，權力作用增大，道德作用就減弱；認為國家具有道德性是誤導的、沒有意義的，國際道德是虛構及虛假的（Carr, 1939）。信任是國際道德的一部分，在國際無政府結構下也就沒有多大作用了。但是 Kydd 就以 Mearsheimer 現實主義理論（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國家動機（motivations）為基礎增加貝治斯（Bayesian）現實主義，此三類現實主義的國家動機探討信任的層次，即是攻勢現實主義的國家動機是安全，但信任層次最低，充滿著不信任，不管國家的動機怎樣，都不會採取合作的行為；守勢現實主義的國家動機也是安全，但信任層次是變動的，不信任是可以改變的，只要相互信任就可以合作，擁有正常關係享有相互安全；貝治斯（Bayesian）現實主義的動機是混合的，除了安全以外還有其他目的，信任層次也是變動的，且可改變的，而且強調理性學習過程帶來正確信念的匯合（Kydd, 2005: 14-19）。簡言之，現實主義的國際信任是在於國家的利益動機，隨著利益動機而變動，但信任的運作空間並不大。利益是先於信任而來，沒有利益就沒有信任。

二、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也假定國家是個理性的行為者，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各國國家利

益競爭與衝突不可避免，但國家之間相互依賴，國家仍是有偏好 (preference) 的選擇，國際合作仍是可能的，藉由國際組織、制度、規範形成的國際建制處理與解決衝突，獲致各國的絕對利得而達到有效的國際治理 (Keohane, 1977)。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可以創造條件，例如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國際制度，使國家之間相互信任。但在創造這些條件之前，國家之間的合作仍是必須先要有信任的存在 (Rathbun, 2011a)。尤其是國家政權類型相同就能先存在著信任關係，例如民主國家之間，這就是自由主義提倡的民主和平假設或理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因為國內民主政治制度的性質促使相互信任與尊敬，若有爭議也會透過民主方式協商及談判處理或解決 (Chernoff, 2004; Maoz, 1997; Muller, 2004)。自由主義也認為互惠有助於國際合作與信任，因為互惠而有互利，促成相互合作及相互信任 ((Keohane, 1986)。尤其是建立「跨政府網絡」(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藉由非正式的制度連結跨國相關人員或機構合作處理相關的國際治理 ((Keohane, 1974; Bach, 2010; Slaughter, 2011)。藉由這非正式的網絡關係先行建立相互信任與合作關係，再轉而建立正式的國家之間的信任關係。同樣地，自由主義也認為高度的信任有助於相互合作建立「跨政府網絡」，以避免國際治理的困境 (Eberlein, 2008)。換言之，信任與「跨政府網絡」是相互作用的，只是非正式的「跨政府網絡」可以超越國家類型或政權性質的差異，建立相互信任關係，而無須以民主國家為重點。

三、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學者 Alexander Wendt 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家之間權力政治所造成的，並非既定存在的狀態，國家及其之間的身分認同先於國家利益 (Wendt, 1992)。Wendt 曾經用「外星人接觸」說明社會威脅是建構而成，不是自然的。首次的姿態決定了外星人是不是威脅，而不是事先假定外星人是威脅。第一次的社會互動創造了相互對未來行為的期望，互惠的互動創造及具體說明了持續的社會結構，藉以界定身分與利益 (Ibid, 405)。就國際體系而言，此社會結構就是「無政府文化」(culture of anarchy)，國家行為是受到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文化的影響，隨著互動而建構成霍布斯型 (Hobbesian)、洛克型 (Lockean) 及康德型 (Kantian) 的無政府文化，其身分也就成為敵人、競爭者及朋友了 (Wendt, 1999: 246-312)。所有的行為者都有其基本的需要，以達成這些需要而生存，國家的基本需要就是國家利益，達成這些國家利益而生存。國家必須相信其基本需要會受到其他國家尊敬，但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這是不可能的，而必須藉由外部限制、自我限制與集體身分認同，尤其是集體身分認同，如果一個國家相信其他國家沒有要併吞

他們，也沒有自我利益的投機主義這麼做，則就較容易相信他們是相同的身分，其基本需要也就受到尊重。其次，自我限制是集體身分認同的最終基礎，它是以尊重相互差異為基礎所形成的文化、共享知識，國家藉由重複遵從規則及規範而內化多元安全社群制度、國內政治外部化（即是自由主義主張的民主和平假設）及自我遵守（self-binding）藉以理解其他國家的意圖而信任（Ibid, 358-363）。這多元安全社群即是各國在以「友誼」（friendship）為角色結構的「康德式無政府文化」（Kantian culture）下相互互動與信任，以共享的理解與知識而構成此安全社群（Ibid, 297-308）。

對建構主義而言，「信任可以最佳被理解為即使不確定也相信。」（Adler, 1998: 29），但這必須先確定或建構身分認同。若是相同的身分認同或安全社群，就是值得信任的朋友；若不是相同，則就不值得信任了。即使其他國家的意圖不明，如果國家選擇信任其他國家，則仍可避免安全困境與威脅，藉由重複的學習、社會化、內化及遵守國際規範而能改變相互主觀的認知，成為相同的身分認同，更增加相互的信任與安全。這就有待於「相信」的習慣了，習慣可以降低不確定性，習慣於信任其他國家並歸列於朋友，自然而然地對其他國家的值得信任度有信心。簡言之，在建構身分認同前，要有信任特定國家的習慣（Hopf, 2010）。然而，特定國家也必須在建構此身分認同之前，以行動遵守承諾及規範建立可信度或信用（credibility），以達成相互主觀的共享理解與知識，促進相互合作與信任。

總結上述三種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國際信任觀點而言，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是先於國際信任而來，甚至不存在國際信任，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先。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偏好先於國家利益，藉由相同國家體制及國際建制而產生國際信任與合作；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集體身分認同先於國家利益，相同國家身分認同而相互建構國際信任。

肆、國際信任與治理的辯證關係

無論何種理論的國際關係學者在探討國際信任之時，多是主張國際信任有助於國際（全球）治理，即是國際信任能提升國際合作，國際合作有助於國際規範的建立、遵守及順服，國際規範順服意味著國際治理的成效，有效的國際治理就能增強國家利益、國家偏好或國家集體認同。這也就涉及到國際信任是否是國際治理的先決條件了，不論是充分條件或是必要條件，都涉及到是否要先有信任的關係才有可能合作或治理呢？誠如本文前言之前的兩段引言所示，這是相當吊詭的，似乎只要有信任關係就可以合作與治理。真的如此嗎？試以「核武非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為例說明信任與治理的關係。

在 1968 年成立的「核武非擴散條約」是作為治理有關於禁止核子武器相關技術與設施輸出擴散的國際規範，其成立與存在都涉及到國際信任，包括簽約國與非簽約國（只有印度、北韓、以色列與巴基斯坦）之間、各簽約國之間、核武國家與非核武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Jan Ruzicka 和 Nicholas J. Wheeler 探索其中涉及的相互信任與不信任，發現該條約在 1990 年代結束以來，這些國家之間的信任關係已經受到限制或扭曲，需要重新恢復原有的信任關係，遂提出若干建議重新活化其信任關係，包括重新活化核武國家與新核武國家之間的談判、建立核武國家之間的信任、擴展與非簽約國家的信任關係（Ruzicka, 2010）。Wheeler 也曾經以阿根廷與巴西在 1980 年代發展出不發展核武的安全社群經驗（領導者與外交人員的相互安全困境動態的敏感度、接受信任的不確定性與易脆性、在菁英與社會層次發展共同利益與價值），建議藉由安全社群建立核武信任關係，而非如 Kenneth Waltz 所主張藉由更多的核武擴散嚇阻、防止核武戰爭（Wheeler, 2009）。即使在敵人之間，若沒有某種程度的互信，又怎能進入和平談判過程及簽署和平協議呢？甚至面對核武滅絕（nuclear omnicide），核武嚇阻就是因為不信任，唯有信任才是解決困境的關鍵（Gralnick, 1998）。

但是這樣的觀點受到 Christoph Bluth 以實際的情勢發展質疑，他認為信任關係並非「核武非擴散條約」動態發展的根本，引進信任概念說明非核武擴散建制的動態發展，這是錯誤的概念化（mis-conceptualisation）。非核武擴散建制的健全是國家之間衝突降低及國際規範擴散的結果，對區域穩定的威脅是持續衝突的結果，並不能藉由建立信任關係來解決，維持「核武非擴散條約」所需要的不是建立信任而是再確認（reassurance）對此建制的遵守及順服（Bluth, 2012）。簡言之，建立信任是不切實際的，「核武非擴散條約」的國際規範建制是利用各種科技驗證及再確認各方的信守程度，而非單單依靠著雙方空幻的信任所能達成。那麼就是先有信任後有治理呢？還是先有治理後有信任呢？還是兩者共有相增呢？

這樣的爭論也就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對於「信任」概念的理論假定了，強調「信任」作用的學者，多是自由主義理論或建構主義學者；忽視「信任」作用的學者多是現實主義者，由於理論假定前提的不同，也就對於「信任」作用有著不同的推論與結論了。

伍、全球氣候治理的危機與弔詭

誠如上述的「核武非擴散條約」例證所說明的信任與治理之關係一般，全球氣候治理也是涉及到管制國家的利益，是要犧牲國家利益還是要基於人類共同利益而服從國際規範，致使全球氣候治理面臨了危機。這其間若是沒有國際信任的

話，國際社會也就無法藉由政治與外交協商制定相關規範，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人類生存威脅。然而，另一方面，各國或是學者反而藉由各種不同的政治論述聯盟，建構全球氣候變遷是一種全球風險，國際社會的決策者之間已凝聚共同的氣候變遷風險認知，但仍有許多國家卻未能同意有效防止全球暖化傷害效應的措施，反而造成全球氣候治理的弔詭。

一、全球氣候治理的危機

建立全球氣候治理與規範涉及到管制各個國家的國家利益，而造成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Wheeler, 2002: 203-225)。但在科學家、非政府組織及若干國家的倡議下，全球氣候變遷自 1979 年第一次「世界氣候會議」(World Climate Conference) 以來，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議題，嘗試建立全球氣候治理與規範 (Weart, 2012)。尤其 1988 年「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及「聯合國環境計畫治理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overning Council) 與加拿大政府共同舉辦「變化中的大氣層世界會議：對全球安全的啟示」(World Conference on Changing Atmospher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ecurity)，因為在多倫多市召開，故暱稱為「多倫多會議」(Toronto Conference)，1988 年 12 月 6 日，聯合國大會第 43/53 號決議支持「世界氣象組織」及「聯合國環境計畫治理理事會建議成立「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小組」(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提供有關氣候變遷可能的環境、社會經濟衝擊的科學評估，其組成成員包含政府官員、大學學者及非政府組織代表。自此之後，該小組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機構，建立起新的全球氣候建制 (Mathiason, 2010)。該小組延續先前的氣候變遷研究組織與會議，依據科學規範、規則及程序而提出相關報告及政策建議，成功地促進國際合作，也促使「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的產生 (Weart, 2012)。

1992 年「地球氣候變遷高峰會議」(Earth Summit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接受「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作為全球氣候變遷治理的基本建制。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將此公約的規範具體訂定 2012 年降低溫室氣體的目標與進程，並在 2005 年 2 月生效施行。由於各方利益及立場，以及執行爭議及與困難，並沒有採取積極的國際行動，尤其是美國政府並未批准此議定書而失敗 (Zia, 2013)。2009 年 12 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五次締約國會議」(哥本哈根會議)，發表了沒有拘束力的政治協議-「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

(Christoff, 2010)。主要就是因為強國（例如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競爭缺乏信任及政治協商，致使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制度設計（Terhalle, 2013）。在召開之前，3月，美國歐巴馬總統為回應批評而提議成立「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Major Economies Forum on Energy and Climate），現有17個國家參與此論壇。¹2011年在南非德班（Durban）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七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七次締約國會議」標註著後京都議定書的全球氣候治理與規範（Olmstead, 2012）。2012年在卡達杜哈（Doha）的氣候高峰會議，也持續展示國際合作建立全球氣候治理與規範的企圖。但這些全球氣候變遷建制都是歷經多年長期的會議協商談判過程，充滿著相互猜疑與不信任，各方政治勢力運用各種策略妥協及協商，才獲致各方接受的結果（Bodansky, 2001: 24-40; Paterson, 1996; Mintzer, 1994; Deledge, 2004）。

然而，這些全球氣候治理與規範仍不及於全球氣候變遷的極端氣候在許多地區造成的災害，尤其這些治理與規範中仍多是沒有約束力的協議，特別是在各國家主權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下，就只能以建立「國際信任」為先決條件，逐漸建立相關的全球氣候治理與規範，共同維護與確保全球氣候變遷的安全。

二、全球氣候治理的弔詭

全球氣候治理已從風險的政治觀點轉為世界風險社會的弔詭（paradoxical）運動，即是藉由各種不同的政治論述聯盟（全球論、發展論、警告論、質疑論及適應論），氣候變遷已經被建構成一種全球風險，國際社會的決策者之間已出現共同的氣候變遷風險認知，但國家卻未能同意有效防止全球暖化傷害效應的措施，仍以自我負責、關係人（stakeholders）參與的志願措施及市場工具。因此，全球氣候是由風險論述所治理，西方國家藉由論述風險的個別志願化保護其免於危險的氣候難民（Rothe, 2011）。遂有些學者提出國際法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礎（Ruppel, 2013），以提供有效的方法建立信任與信心。因為建立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議題是信任與信用，國家之間必須相互信任，必須假定對方是有信用的，信守承諾（Biermann, 2005）。尤其是多層次治理下，全球氣候治理需要以審議式民主方式（deliberative democratic approach）藉由開放的論述競爭及參與，而能確保其正當性及效能，獲得各參與者的信任（Stevenson, 2012）。

哈佛大學氣候協議計畫（The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對於「聯

¹ Major Economies Forum on Energy and Climate, “About,”
<http://www.majoreconomiesforum.org/about.html>(檢索日期:2014/2/12)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政策建議中就提出氣候治理機構學習能力的重要性，學習能力可以幫助建立信任，尤其發展中國家不信任已開發國家會信守緩和的承諾，已開發國家不信任開發中國家會慎重降低排放。遂建議由外部的民間治理（private governance）及其他組織的學習協助降低不確定性，建立知識及信任。²例如 Anesu Makina 就指出非洲國家在全球氣候變遷建制的談判過程中，南方（落後）國家與北方（先進）國家之間的分裂，尤其在此公約的談判結構上，各方結盟以強化談判力量維護國家利益，非洲國家結盟成立的「非洲集團國家」（Africa Group）作為談判的盟邦，並以「非洲環境部長級會議」（The Africa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及「非洲集團國家談判者」（African Group of Negotiators）形成「非洲國家環境與發展共同立場」（African Common Posi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甚至成立「非洲國家與政府首長氣候變遷委員會」（Committee of African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Climate Change），藉以展現非洲國家的團結擴展其談判力量維護與爭取其利益。另外，在談判過程中，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七十七國家集團」（G-77）及由巴西、中國大陸、印度與南非組成的「卑希克四國」（BASIC）相互結盟，打破了以南北國家作為談判結盟的分析架構，展現出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實力與限制。即使如此，非洲集團國家仍不敵已開發國家的談判力量、能力及策略而失敗（Makina, 2013）。

但是在談判過程中，尤其是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也顯現出在普遍的國際談判中，國家的角色與地位受到非國家行為者（非政府組織、科學家等）的挑戰，而且以國際條約或協議方式也是受到以個體、地方、企業等多層次治理的挑戰（Hoffman, 2006）。這也是因為國家之間的談判，若沒有制度的正當性是無法確保各項條約或協議的履行及遵守（Cadman, 2013）。

2007 年 12 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峇里行動方案」（Bali Action Plan）提出了已開發國家「測量、回報及驗證」（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系統及開發中國家「適合本國的緩解行動」（National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以共同承擔責任，確保有效降低 2012 年後排放的溫室氣體。歷經後續幾次的大會而建立較完整的盤查、登錄及查證作業規定及程序，藉由科技協助增加透明度，以建立各國（尤其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信任關係，甚至是對全球氣候變遷治理及建制的信任（Lovbrand, 2009）。另外，由德國政府資助成立的「德國觀察」（Gemanwatch）及非政府組織「歐洲氣候行動網絡」（Climate Action Network Europe）更建立「全球氣候變遷績效指

² The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 “Instit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Policy Brief, 2010-1*, Cambridge, MA: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 November 2010.

數」(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針對國家的政策、溫室氣體排放程度、部分別二氧化碳排放趨勢、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及二氧化碳密度等 5 大面向 15 項指標項目進行評比，以增加主要排放各國相關績效的透明度，並增加對該國的政治壓力而提升全球氣候治理的信任 (Burk, 2014)。³

「國際治理創新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也提出建立各國相互理解與信任的建議，包括藉由論壇開放討論富國與窮國平等供同分擔氣候變遷的負擔，強化過程的透明度及涵蓋範圍 (inclusivity)，先從非正式論壇開始，使討論能超越正式的國家立場，以建立對話、理解與信任的基礎，再將相互理解與信任的協議轉入公開談判之中 (Milkoreit, 2011: 7)。特別是全球氣候合作的信任更涉及到對於相關知識的信任，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甚至是全國層級與地方層級之間 (Tennberg, 2007)。

簡言之，全球氣候治理仍在積極藉由參與、論壇、透明、及驗證等等方式，尋求建立國際信任的基礎，以訂定各項相關的國際規範，並配合經貿措施要求遵守全球氣候規範，以達到有效的國際治理。在此其間，全球氣候治理不時存在著危機與弔詭，唯有以人類共同生存為最高考量，賦以國際社會道德規範的責任，以建立國際信任的基礎，形塑全球公民的集體認同，超越國家利益而服從國際氣候治理規範。

陸、結論

誠如 Nicholas Rengger 所言，順服或服從國際規範是假定了國際信任，信任具有習慣的特質，它不是有意識的作為而是經過考慮的反思 (considered reflection) 作為，在長期合作的實務過程中所培養成的習慣。國家之間在合作中培養成相互信任的習慣，這樣的信任具體鑲嵌在國際制度之中，甚至成為國際社會的「公共倫理」(public ethics)，當國家違背信任 (例如不遵守所簽署的公約、協議等) 時就會感到「國際羞恥」，進而促使國家更加順服國際制度與規範 (Rengger, 1997)。目前，即使全球氣候規範與建制治理仍未能有效治理，但已經逐漸制度化中。其中，國家之間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國際信任，差異的是相對程度而已，這是因為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極端氣候，各個國家深知唯有相互合作與相互信任才能因應此危機，但面對國家利益 (尤其是國家經濟發展) 的考量，

³ 自 2006 年起每年出版評比報告，每年約評比五十多個國家，中華民國(台灣)於 2009 年起納入評比。今年的報告，參閱 Jan Burk, Franziska Marten, Christoph Bals, 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14 <<https://germanwatch.org/en/7677>>(檢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4 日)

不同國家對於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之間先後關係不免產生差異的觀點。當然，這樣的論點仍有待實際的個案研究說明，例如 Hayley Stevenson 以建構主義說明印度、西班牙及澳洲三國遵守國際氣候規範及採取相關的國內政策 (Stevenson, 2013)。Charles Parker 和 Christet Karlsson 則是以自由主義探討歐盟在氣候變遷談判與規範中的領導者角色與作用 (Parker, 2010)，Steven Bernstein 等人也用自由主義觀點批判以現實主義觀點審視哥本哈根協議的主張，認為此協議具有自由主義的理想及觀點 (Bernstein, 2010)。也有學者運用自由主義的「跨政府網絡」觀點，說明權威類型（公、私及公私混合）對跨國氣候治理的影響 (Andonova, 2009)。Sevasti-Eleni Vezirgiannidou 以現實主義的相對利得觀點說明 2001 年美國參議院在化石燃料遊說團體的影響下，關切與中國大陸的相對利得而沒有批准京都議定書，因為美國執行此議定書的成本遠高過於中國大陸 (Vezirgiannidou, 2008)。從這些研究中，即可發現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就會存在不同的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

若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而言，順著不同理論的信任觀點推論，或有先利益後信任的現實主義觀點，或有先偏好再信任而後利益的自由主義觀點，以及有先身分認同再信任而後利益的建構主義觀點。無論何種觀點，在研究全球氣候治理議題中，都可以選擇不同的理論觀察特定國家或集團國家的國際信任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而綜合理論觀點分析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

參考文獻

- Adler, Emanuel & Michael Barnett.(1998).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onova, Liliana B. & Michele M. Betsill. (2009). Trans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9(2), 52-73.
- Bach, David & Abraham L. Newman. (2010).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Domestic Policy Convergence: Evidence from Inside Trading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 505-528.
- Balzacq, Thierry & Amelia Hadfield. (2012). Differentiation and Trust: Prüm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EU Inter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7(4), 539-561.
- Bernstein, Steven, Michele Betsill, Matthew J. Hoffmann & Matthew Paterson. (2010). A Tale of Two Copenhagens: Carbon Markets and Clim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9(1), 161-173.
- Betsill, Michele M. & Harriet Bulkeley. (2006). Cities and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12(2), 141-159.
- Biermann, Frank. (2005).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South: Strategic Choices for European Climate Policy. *Climate Policy*. 5(2), 273-290.
- Bluth, Christoph. (2012). The Irrelevance of ‘Trust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Reconsidering the Dynamics of Prolife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1), 115-130.
- Bodansky, Daniel. (2001). The Histor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In Luterbacher Urs and Detlef Sprinz(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Booth, Ken & Nicholas J. Wheeler. (2008).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rewer, Paul R., Kimberly Gross, Sean Aday & Lars Willnat. (2004).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1), 93-109.
- Bull, Hedley. (1995).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 Burk, Jan, Franziska Marten & Christoph Bals. (2014). **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14** . <<https://germanwatch.org/en/7677>>(檢索日期:2014年2月14日)
- Cadman, Timothy. (2013).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Policy Regimes: Towar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arr, Edward. (1939).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arter, Michael R. & Marco Castillo. (2011). Trustworthiness and Social Capital in South Africa: Analysis of Actual Living Standards Data and Artificial Field Experim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9(4), 695-772.
- Chernoff, Fred. (2004).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Peace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6(1), 49-78.
- Christoff, Peter. (2010). Cold Climate in Copenhag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COP 15.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9(4), 637-656.
- Cross, Sharyl, Savo Kentera, R. Craig Nation & Radovan Vakudinovic(eds.). (2013). *Shaping the South East Europe's Security Communit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eledge, Joanna. (2004). *The Organization of Global Negotiations: Constructing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London: Routledge.
- Eberlein, Burkard & Abraham L. Newman. (2008). Escaping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Dilemma? Incorporated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 in the European Union. *Governance*. 21(1), 24-52.
- Figueres, Christiana & MariaH. Ivanova. (2002).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Interests or a Global Regime?, In Daniel C. Esty and Maria H. Ivanova(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ptions and Opportunities*. New Haven, CT: Yale School of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iczi, Johanna & Endre Sik. (2009).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Europe. *Tarki European Social Report 2009*. Printing: Duna Palota Nonprofit Ltd.
- Gralnick, Alexander. (1988). Trust, Deterrence, Realism, and Nuclear Omnicide. *Political Psychology*. 9(1), 175-188.
- Hertz, John. (1950).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2), 157-180.

- Hertz, John. (2003).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4), 411-416.
- Hoffman, Aaron M. (2002).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3), 376-379.
- Hoffman, Aaron M. (2006).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lbany: SUNY Press.
- Hoffmann, Matthew J. (2011). *Climate Governance at the Crossroads: Experimenting with a Global Response after Kyo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pf, Ted. (2010). 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4), 539-561.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317-349.
- Jervis, Robert. (2001).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3(1), 36-60.
-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 Jr. (1974).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27(1), 39-63.
- Keohane, Robert O. & Joseph S. Nye, Jr.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 Keohane, Robert O. (1986).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1), 1-27.
- Kydd, Andrew H. (2005).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rson, Deborah Welch. (1997).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8(3), 701-734.
- Lovbrand, Eva & Johannes Stripple. (2009). Governing the Climate from Space: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as Ordering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9 Amsterdam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People, Places and Planet**. December 2-4 2009, Amsterdam, Holland.
- Major Economies Forum on Energy and Climate. (2014). **About**. <http://www.majoreconomiesforum.org/about.html>(檢索日期:2014/2/12)

- Makina, Anesu. (2013). Managing Climate Change: The Africa Group in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 4(1), 37-48.
- Maoz, Zeev. (1997).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emocratic Peace: Rearguard Action or Cracks in the Wal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1), 162-198.
- Mathiason, John & Medani Prasad Bhandari. (2010). Getting the Facts Right: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w Climate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 1(1), 57-71.
- Mearsheimer, John J.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5-49.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Michel, Torsten. (2012). Time to Get Emotional: Phronetic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 869-890.
- Michel, Torsten. (2013). Trust, Rationality, and Vulner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manda Russell Beattie and Kate Schick(eds.), *The Vulnerable Subject: Beyond R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ilkoreit, Manjana & Jason J. Blackstock. (2011). *Taking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2012: Reflection on CIGI,10*. Ontario, Canada: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 Mintzer, Irving M. & J. Amber Leonard. (1994). *Negoti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Rio Conv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Harald. (2004). The Antinomy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1(4), 494-520.
- Olmstead, Sheila M. & Robert N. Stavins, (2012). Three Key Elements of a Post-2012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6(1), 65-85.
- Parker, Charles F. & Christer Karlsson. (2010).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Leadership Movement: An Inconvenient Trut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8(4), 923-943.
- Paterson, Matthew. (1996). *Global Warming and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Rathbum, Brian C. (2011a).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thbun, Brian C. (2011b). From Vicious to Virtuous Circle: Moralistic Trust, Diffuse Reciprocity, and the American Security Commitment to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2), 323-344.
- Rengger, Nicholas. (1997). The Ethics of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3(3), 469-487.
- Rothe, Delf. (2011). Managing Climate Risks or Risking a Managerial Climate: State,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gim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5(3), 330-345.
- Ruppel, Oliver C., Christian Roschmann & Katharina Ruppel-Schlichting. (2013). *Climate Change :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Governance*. Baden-Baden : Nomos.
- Ruzicka, Jan & Nicholas J. Wheeler. (2010). The Puzzle of Trust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6(1), 69-85.
- Slaughter, Anne-Marie & Thomas N. Hale. (2011).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In Mark Bevir(ed.), *The Handbook of Governance*. London: Sage.
- Stevenson, Hayley & John S. Dryzek. (2012). The Legitimacy of Multilateral Climate Governance: A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Approach.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6(1), 1-18.
- Stevenson, Hayley. (2013). *Institutionalizing Unsustainability : The Paradox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ennberg, Monica. (2007). Trus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western Russi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3), 321-335.
- Terhalle, Maximilian & Joanne Depledge. (2013). Great-Power Politics, Order Transition, and Climate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limate Policy*. 13(5), 572-588.
- The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 (2010). Instit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Policy Brief 2010-1*. Cambridge, MA: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
- Vezirgiannidou, Sevasti-Eleni. (2008). The Kyoto Agreement and the Pursuit of Relative Gain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7(1), 40-57.
- Weart, Spencer R. (2012).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limate

- Science. *Jour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 3(1), 41-59.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eeler, Nicholas J. (2009). Beyond Waltz's Nuclear World: More Trust May be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3), 428-445.
- Zelli, Fariborz. (2011).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2(2), 255-270.
- Zia, Asim. (2013). *Post-Kyoto Climate Governance: Confronting the Politics of Scale, Ideology,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投稿日期：103 年 10 月 16 日；採用日期：103 年 11 月 25 日)